

简论容闳同曾国藩的关系

郭吾真

1863年至1872年(同治2年至11年)间,由于容闳同曾国藩的合作,中国成就了两项新型事业——第一家新式大型兵工厂建成,第一批官派少年留学生出国。这些都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旧中国迈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重大步伐。对于二人合作的原因、合作的性质和意义问题略作探索,当多少有助于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一

容闳(1828~1912)同曾国藩(1811~1872)成长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教育体制之下,意识形态之迥不相侔,不言而喻。“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的合作共事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们毕竟是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又同具有引进“西学”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不期然而然地走在一起,共同办成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开拓性事业,也在情理之中。

开始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深渊的鸦片战争以后,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各种社会势力都为解除自感切肤之痛的危机,苦心焦虑,摸索自救之道。

于是,代表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利益的农民群众,自发走上彻底翻身的反清反封建道路,掀起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风暴,将腐朽清统治推向灭顶的边缘。代表大地主统治阶级利益的,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派封建官僚群,因已确认西方“坚船利炮”有助于扑灭革命烈火,稳定封建秩序,挽救清王朝,从而逐渐放弃传统的天朝至尊和盲目排外政策,确定了一条借“西法”办“自强新政”的政治路线,开展以“中体西用”为纲领的洋务运动。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则在不同程度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科技、政治、文教知识以后,提出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改良文教乃至政治军事的变法维新要求,以导致中国走上独立富强文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冯桂芬、王韬,当过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和完全成长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下的容闳,都是这一要求的杰出体现者。

容闳同曾国藩建立合作关系,正是那种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产物。自然,他们是从完全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的。

二

容闳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唯一未受封建传统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早期留洋学生中唯一保持民族自尊和爱国赤诚的优秀中华儿女。他虽然加入美国国籍,接受基

基督教信仰，却始终以富强中国为己任，至死不渝。正如一位美国人特韦契耳所赞叹的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①容闳的全部政治生涯——从效力洋务运动，而参加维新运动，而支持民主革命运动，乃至临终时恳切教诲两个生长于美国的爱子一定要献身祖国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历史实践，已为之做出科学的结论。

容闳出身贫寒，家乡又密迩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集中的澳门与香港。这就决定了他长期与洋人杂居的未来命运。父母出于盼他学会英文，以便将来可在洋人手下谋一啖饭之所的可悲求生欲望，在他七岁时就送他进入澳门英人所办小学，免费读书。

1839年(道光19年)，在中国境内正式传播“西学”的第一所西方教会学校——英人所办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张。鸦片战争以后该校迁香港。容闳在此校开始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初步的启迪。1846年(道光26年)毕业时，他的“西学”造诣已为将来创业打下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英国哲人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格言，使他受益极大。他从中窥测到西方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所在，因而产生了亲自到西方直接接受新知识，为将来报效祖国储备力量的向往。

翌年，他同另两位有志同学在美籍教师布朗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告别家乡，随布朗前往美国，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苦学生涯。

容闳留学美国七年，是勤奋攻读，勇于服务，战胜困难，和滋长教育救国思想的七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他在入大学前断然拒绝了将来当传教士的诱惑，断绝了一些“慈善性”资助学费的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1850年至1854年(道光30年至咸丰4年)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主要靠勤工俭学赚取学费，可谓历尽了艰苦。他在严峻的困难面前，毫不气馁，既突出地表现了乐于劳动服务的高尚品德，又获得因苦学不懈而来的优良学习成绩，给全校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以亚洲第一位留学生身份毕业于耶鲁大学之时，几乎轰动了四周的整个社会。很多名流都为一睹其风采，纷纷参加该校毕业典礼。一位名布什内耳的博士还特别同他谈了话。当该博士获悉：经常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中国问题，充满爱国精神的文章作者就是面前这位中国青年时，不禁肃然起敬，发为由衷的赞叹。^②当他晚年回忆自己的生平时，曾慨乎言之：

“……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受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③

由此可见，他长期为之呕心沥血而奋斗的爱国“教育计划”，早已孕育于留学之时。他确信，西方的“文明教育”既可致欧美于文明富强之境，自然也可使中国收同样效益。他渴望用“文明教育”提高中国“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改善“国民”的素质，从而改善中国的现状。理想不可谓不高，也十分切中时弊。他自然还认识不到，致中国于“腐败”和陷“国民”于“无限痛苦”的根源，是禁锢中华民族的顽强而悠久的封建专制体制，还不了解不铲除这个根源，他的美妙理想终不免于落空。

正因为他信心十足，客观形势也有相应的需要，所以他一毕业就置个人的穷通于不

①②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代跋》。

③《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3页。

顾，断然负笈归国，决心为实现其报国宿愿而奋斗。他在国内并无可以攀附的显赫社会关系，完全要靠一颗忠心，满腔热血，孤军作战。处境之坎坷可想而知。因此，他在1863年会见曾国藩之前，徬徨歧路达八年之久，然而毫未挫折其摸索前进的进取精神和蓬勃锐气。

容闳在曲折道路上所尝的甘苦，是因血腥镇压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大官僚曾国藩所难以想象于万一的。

三

与容闳为振兴中华而引进“西学”的志趣不同，曾国藩是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正式合流，镇压革命人民，和中兴清封建统治的需要，以“中体西用”论为指导，开始其办洋务生涯的。他原是传统封建教育塑造成的大官僚群体的重要成员，儒学根底深厚，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十分顽强，但又能以儒学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反对空疏，讲求实学的哲理和精神，顺应大变革的时代潮流，实事求是地因时制宜，大胆修改某些传统观念，在从政治军中取得一些经世致用的实效。

曾国藩带头修改清王朝传统的对外旧观念，将传统的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的政策，改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与“守定和约”^①。在使西方侵略者确信清廷已放下天朝架子，乐于遵守不平等条约，因而给以消灭革命的实力支持方面，就曾起了极大的作用。曾国藩也曾受过林则徐和魏源等前辈爱国者“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影响。但他在“新观念”支配下，将林、魏的口号篡改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②也表明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西方确有胜于中国的“长技”，而公然倡导借“西法”维护封建体制。于是，他同耻于“用夷变夏”和“师事夷人”的顽固派之间，产生了非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并因此成了洋务派的魁首。相形之下，洋务派确实比顽固派有所进步。因为他们毕竟敢于睁眼看世界，不论看得真确与否，终不失为顺应时代潮流而行的“识时务者”。

1860年（咸丰10年）在京师礼部大堂签订《北京条约》之时，是洋务派正式诞生之日。清政府留京钦差奕訢等亲王大臣首先扮演了这角色，粉墨登场，为洋务运动拉开了帷幕。曾国藩则以“剿匪”首要统帅和两江总督身份，泡制了一整套指导洋务运动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左右晚清政局三十余年，影响旧中国政局八九十年，对于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深渊的沉沦，起了极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曾国藩的“理论原则”同清廷正式向侵略者“借师助剿”的决策相辅相成。他在表示“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的冠冕堂皇意见之后，^③赤裸裸地亮出了如下一段肺腑之言：“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④翌年再次陈情，发挥了前奏未竟之意：“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

①王少普：《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④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国藩全集》二，世界书局版，第370页。

③同上，第369页。

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①

这两份奏议表明两大动向，一是为洋务运动确定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二是肯定了购买与制造“洋器物”为反革命战争的当务之急和“安内攘外”^②的最佳策略。不言而喻，“攘外”的思想他也有，但必先“安内”，“安内”是“攘外”的先决条件。既购买而又制造“洋器物”以加强“剿贼”的实力，自然显出异常的迫切性。拚命罗致人才，招贤纳士，充实智囊，便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从五十年代起，曾国藩已多次获得利用“洋器”克敌制胜的实效。上述意见，可以说是他从事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1861年9月（咸丰11年8月）湘军攻占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之后，立即设立仿制洋兵器的安庆内军械所，招致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著名科技家为之出谋划策。于是，“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机器等等专门家”，大都受到曾国藩的垂青。“全国人才之精华”，几乎“无不毕集”于其麾下。一如历代奸雄故事，他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③极尽礼贤下士之能事。从谋士们劝告他另“设一西式机器厂”^④以仿造高效能新兵器一事而论，可知已设之安庆内军械厂远不能满足其需要。所以他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并做出照办的决定。但要付诸实施，首先须具备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洋情的人才，以供驱驰。然而，无论是他的智囊团，还是新兴京师同文馆之类培养洋务人员的洋学堂，都难以提供如此理想的通才。

正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关键时刻，通过得力幕僚的保荐，容闳这位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成为最合格的人选。

四

容闳同曾国藩建交于1863年（同治4年）。当时的容闳，正以满腔热血，报国无门的矛盾心情，在译书生涯中继续摸索前进。

他于1855年（咸丰5年）回国以后，也曾有过结识清朝“达官”以行其富强中国素志的幻想，但很快就自我否定了。徘徊四五年之后，他决定前往太平天国首都碰碰运气。这个决定并非出于偶然，而确有其逻辑的根据。第一，他回国之初，曾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一次就滥杀广州群众七八万人的刑场惨剧，加深了他对满清暴政的憎恶，因而寄同情于太平革命。他甚至产生过投身革命的念头。第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他在香港结识的好友，也有志于效法西方振兴中华，当时正在天京执掌朝政，似有助于他救国计划的实行。基于这两个原因，容乃有访问天京之行。时在1860年11月（咸丰10年10月）。

容闳到天京后，受到老朋友的热情接待和许多革命者的礼遇。他逗留天京一个月，同洪仁玕交换了关于如何富强中国的意见，受到很大的鼓舞，因而起草了著名的富强中国意见书，呈请洪仁玕玉成其事。他表示，其计划如被采纳试行，情愿以一名革命军

^{①②}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国藩全集》二，第417页。

^③《西学东渐记》，第74页。

“马前走卒”，贡献全力。^①

他的包括七项主要内容的意见书是建设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所必需的政治、军事、财经、文教等全面革新的基本措施，但完全脱离太平天国、乃至当时全中国的实际，所以虽然充满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却丝毫没有可行性，以致虽博得赞扬，却只能被束之高阁，一如上年洪仁玕所提革新方案《资政新篇》的命运。容闳失望之余，凄然谢绝革命朋友的盛情挽留，告别天京，重新陷于茫然摸索之中。

容闳怀着百折不挠的爱国锐志，到上海选择了翻译西书以传播“西学”的道路。当时上海译西书的空气已颇活跃，他认为也不失为报效国家的一个途径。在译书活动中，他又结识了不少科技界的中外新朋友。精研西学，译著卓越的名算学家李善兰，是他新交中最重要的一员。就由于这位李善兰的热心撮合，容闳同曾国藩的合作关系才奇迹般地建立，为实行其爱国“教育计划”架起了桥梁。

容、曾合作的历史是很短暂的，但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划时代意义，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兹分两个阶段以阐明之。

第一阶段，1863年至1868年（同治2年至同治7年）。这是以引进成套西方机器用以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为主，和容闳理想初步实现的时期。

1863年8月，容闳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李善兰等友人的诚恳介绍和曾国藩的两次函邀，从上海到达安庆的湘军司令部，同曾国藩开始会见。老于世故和善于礼贤的大官僚曾国藩，初次相逢，就给容闳留下终身难忘的良好印象。两次会谈之后，曾国藩就在谋士们的斡旋下，迅速做出派遣容闳出洋，“全权”购买成套机器的决定。这种果断的作风和敢于用人的气度，使容闳对曾国藩其人曾存有的戒心，涣然冰释。

曾国藩坚决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决心引进“西法”以制炮造船的既定方针，并无碍于他倾听容闳畅谈其理想的和谐气氛。容闳直抒胸臆，倾吐了他对引进、学习和消化“西法”，以促进中国独立自主地实行工业化的见解。他坦率地阐述了中国应当“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建立一个能制造各种“有用”工具的“机器母厂”，不可以专造兵器为宗旨的意见。这明确地表示他是从促进全国社会生产机械化从而富强中国的动机出发，向曾国藩所献的一个近代化基本建设的总体规划。他企图充分发挥中国固有之各种优势，如资源丰富，人工价廉等等条件，借用“西学”，以自力更生，达到摆脱依赖外国的枷锁，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理想境界。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追求。弦外之音，也饱含有他对完全依赖购买外国机器的一些自发批判性意味。这种出自一百二十多年前一位并未专攻经济学和机械工程学的留洋学生之口的意见，无论如何脱离实际，可行性多么渺茫，终不失为感人至深、富国利民慷慨陈词。他本能地感到曾国藩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他的遐想，所以又违心地强调说，“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实际是指清王朝），较他物尤为重要”，^②以表示对曾国藩尊重。可以断言，不能轻易错过大可利用的机会，是他的本意所在。在他姑妄言之，曾国藩姑妄听之的场合中，他欣然接受了曾国藩授予的“出洋委员”官衔和六万八千两纹银的巨额现款，“全权”办妥向美国大规模订造机器的种种手续，然后束装就道。这一切，都反映

^{①②}《西学东渐记》第57页，第75～76页。

了容、曾二人已建立互相信赖，密切配合的不寻常关系。

1865年（同治4年），容闳圆满完成订购机器的任务，把一百数十种机器安全地运回上海，并由官方用以装备了新建的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设想“设立西式机器厂”的计划，至此实现。这个“局”是中国第一所大规模引进全套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创建的新式兵工厂，也是洋务运动的第一项大型建设。它首先生产洋式兵器，后又兼造轮船，在清政府继续镇压反清势力，维护其反动统治方面起了为虎作伥的反动作用，但也在更新国防力量，特别是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和分解封建经济结构方面，直接间接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不仅全由引进的西方机器设备而建成，而且多赖引进的西方工程技术人员而存在，管理生产制造的大权，几乎都操诸洋人之手。清政府只是委派“总办”等经管官员，和提取专供官军用的洋式枪炮等制造成品而已。这种现状是容闳十分反感的。

那已是太平天国政权被颠覆的第二年。曾国藩仍然为镇压起义人民的战争，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共同效命疆场。江南制造局为他们追求的“自强”、“中兴”大业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对此，容闳显然立了大功。曾国藩及时以《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①，请清廷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候补，以示优异，而励其功”。^②容闳旋被任命为江苏省布政司衙门的译员，驻上海办公，享受远过一般四品衔候补道的优厚待遇，表明他在曾国藩心目中的非凡地位。但他并未以此为满足，而仍梦寐以求其救国之道，特别是爱国“教育计划”的实现。曾国藩1867年复任两江总督，和丁日昌1868年升任江苏巡抚，给他带来两个曙光在望的良好机会。

第一，“教育救国”理想初步实现。1863年曾国藩特意到上海对其“亲创的江南制造局”进行视察。当他目睹机器神速地运转，和枪炮被奇妙地造出时，不禁惊喜若狂。陪同视察的容闳，乘机提出一个“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的建议，^③请曾采纳照办。他保证这个学校必可给中国人提供最好的学习与实习操纵机器的机会。被引进的技术也将会很好地被消化吸收，变为己有。江南制造局将可不再依赖外国人，而完全成为由中国人独立地经营管理的国有企业。操纵与维修乃至制造机器，都可以自力更生。那时就可不再仰外国工程师的鼻息。曾国藩正在陶醉于自己“自强”措施的兴头上，欣然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兵工学校不久开办就绪，着手进行培训工程技术人员的活动。很快它就为洋务派，实际也是为旧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能人，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积蓄了一定数量的新兴生产力因素。容闳教育为中国独立自主服务的理想初见成效。

容闳因其“文明教育”维新中国的宿愿初步得偿，深感欣慰，争取完全实现其“教育计划”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①《曾国藩全集》二，第799页。

②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第37页。

③《西学东渐记》，第84页。

第二,“教育计划”正式诞生。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重要助手丁日昌,是容闳“教育计划”决定性的积极催生者。丁对提倡引进“西学”以“御侮”、“自强”的洋务极为热心,因此,在任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总局总办时,同容闳建成“莫逆”之交。1868年丁升任江苏巡抚,容闳正因兵工学校的顺利建成而大受鼓舞,要求丁日昌以巡抚身份向朝廷进言,希望将他的“教育计划”付诸实施。这个计划大体上是要求清政府派遣众多幼童出洋留学,幼童们学成归国,可更有效地利用“西学”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界。丁日昌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敦促他写成书面,并及时代为上奏。该计划由如下四项内容组成:

一、组织一个由中国人集资经营的轮船公司,从事普通运输,兼营漕运。每年由政府拨付一定补贴,以保证营业旺盛,与外商在中国经营的航运业作有效竞争,从而维护民族利益;

二、政府以官费选派十二至十四岁的优秀男性青少年出洋留学,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先试行招收一百二十名,每年选派三十名,分四批派完。经费可由上海海关税收中拨付;

三、开采矿藏以尽地力,修筑铁路,以利交通运输,主要以直接运输所开矿产为务;

四、严厉禁止外国侵犯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禁止外国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包庇教民,和插手民事与刑事诉讼案件。^①

全部建议的重点在第二项,所以统称为“教育计划”。“教育计划”凝聚了他积之已久的爱国主义赤诚,但在当时的中国,能理解他这一片爱国赤诚的人,可谓寥若晨星。丁日昌积极予以支持,要求有交情的总理衙门大臣、满族洋务派大官僚文祥予以成全。不料文祥“丁忧”离职,旋即病故,“教育计划”从此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但到此为止,容闳毕竟已从同曾国藩的合作中取得相当成就,他的“教育计划”也已定型。这就为下一阶段更有成效的容、曾合作奠定可靠的基础。

第二阶段,1868年至1872年(同治7年至11年)。这是“教育计划”开始实行的时期。

1868年丁日昌代呈中央的“教育计划”被搁浅后,容闳虽极端苦恼而毫未消沉。他仍不时利用办公的机会,恳请丁日昌鼎力相助,求丁代向曾国藩进言,成全其报国之志。就在如此蹉跎岁月之际,容闳所忧虑的外国教会不法行为果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震动中外的1870年(同治9年)天津教案。此案由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负责处理。曾国藩遵照清政府以“委曲求全”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以辱国丧权的条件草草结案,却意外地为容闳“教育计划”的实行开了绿灯。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由包括丁日昌在内的几个大员共同参与。为了翻译的需要,丁日昌在中法“谈判”行将结束之时,邀请容闳北上协助。容闳抵天津后,向丁日昌重申前请。丁便于教案结束后及时将容闳的“计划”向曾国藩作了详细介绍,请曾出面促成之。曾国藩出于培养高质量“自强”洋务人员的迫切需要,不仅表示首肯,而且

^①《西学东渐记》,第86~87页。

迅即联合诸大员，由他领衔，奏请北京清中央批准官派留学童出国学习的要求。容闳为此兴奋到夜不成寐。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不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清统治，即使“教育计划”完全实现，也难以致中国于真正独立富强之境。他更未料到，在“计划”开始实行时，封建顽固势力已设置重重障碍，肆行阻挠破坏。

1871年9月3日（同治10年7月19日），复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领衔会同直隶李鸿章以选派幼童赴泰西“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渐图自强”为由，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①奏请清廷及时审批执行。对于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和管理办法，《章程》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份奏折由容闳代为起草，《章程》几乎全是容闳的设计。这反映了曾国藩高度信赖容闳和二人合作的密切关系。

1872年2月27日（同治11年正月19日），曾国藩又奏请清廷从速落实选派留学幼童的计划，并奏明委派一个守旧官员陈兰彬与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对于容闳如何熟悉洋情，如何可以信任，特别向清廷作了介绍，表明他对容闳的极端倚重。于是由容闳负责招生和同美国具体联系学生抵美后入学等一切有关事宜，并在上海设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即留美预备学校，对出洋幼童先施以一定的训练，作为出洋准备。容闳招足原定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后，先期赴美，从事安排幼童们抵美后的食宿学习诸事。三十名幼童经过几个月的必要训练，于是年夏季由陈兰彬等率领集体赴美。中国官派留洋学生的新纪元自此开始。这在封闭型的中国教育史上，无疑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迄1875年（光绪元年）止，全部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依原定计划分批派遣完毕。一年前，容闳已在美国建成一个留学生事务所，将作为“永久办公之地”，^②他已下定毕生为留学事务献身的决心。他对曾国藩感激知遇的心情，此时也升华到无以复加的境界。

曾国藩已于1872年3月亡故，未能目睹幼童们乘风破浪出洋留学的盛况。容闳深以为憾，立志用培植一批批国家栋梁的辉煌业绩，酬答曾国藩玉成其事的情谊。当以陈兰彬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中伤诬陷的恶浪滚滚袭来，特别是1881年（光绪7年）清廷突然下令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把他“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的“教育计划”毁于一旦的不幸时刻，更加倍深化了他对曾国藩的敬佩与怀念之情，以致做出曾虽死而精神不朽，后来众多中国青年“得受文明教育”全属曾的“遗泽”^③云云的不恰当结论。

容闳做梦也未想到，当年丁日昌向他介绍曾国藩推荐陈兰彬充任留学生正监督的用意，正是防范他将来放手办事的一个重大措施。丁曾直言不讳地对他指出，他的“新学”思想为顽固守旧派所深恶，他的势力又不足以同守旧派的势力相抗衡。所以曾国藩特意指派陈兰彬这个“旧学派”同他共事，保持平衡，“可以稍杀阻力”，^④实际是对他的一种牵制。容闳不明真相，竟认为曾的措施是善意的折冲，和对他的爱护，以致感激不已。曾深知，如果听任容闳的热情一往无前，不加阻遏，必致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规范遭受致命的冲击。这决非他这种旨在维护封建统治体制的洋务派大官僚所能容忍。

^①《洋务运动》（资料），二，第153～159页。

^{②③④}《西学东渐记》，第95页，93页，91页。

容闳反而引曾国藩为他在清朝官僚界的唯一知音，只能证明他相当的无知与天真。

容闳的“教育计划”具体地说是夭折了，宏观地看，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社会效益，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很大无形的分解作用。例如，留学生中涌现了卓越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对振兴中华做出杰出贡献，永垂青史，固然尽人皆知。其它有造诣的各种人才，在资本主义近代化工作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影响，也几乎有口皆碑，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历史性促进作用。“西方学术”，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无形中日益广泛传播，官派或自费留学外国的活动，不久也蔚然成风。这些，固然不能否认为中国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的趋势所促成，但也决不能排除容闳“教育计划”在同曾国藩合作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容闳晚年每引以为莫大安慰，是不无根据的。这却非曾国藩始料所能及。

由此可见，对于容、曾合作第二阶段的成果，也应实事求是地给以积极的评价。

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断言：

第一，容闳和曾国藩共同成就的事业，对于开始突破中国封闭状态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无疑具有大辘轳式的开拓性意义，决不能因某人动机不纯或某事起过反动作用而加以贬值或否定。

第二，容闳和曾国藩的关系是互相利用对方优势和互相依存的对等合作关系。缺少一方，他方便一筹莫展。因此，决不能因一方是手握发号施令权的大官僚，另一方是奉命办事的小角色，而形式主义地把他们看作上下级或主从的关系。

第三，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对立的，一方是资产阶级维新主义先驱者，另一方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大官僚。他们各自追求“西学”的不同政治目的，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阶级矛盾性。但他们都缺乏阶级学说的理论知识，而只有强烈的自发阶级意识，都是本能地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第四，容闳并未因同曾国藩的相契而成为洋务派的一员，曾国藩也未因崇尚“西学”转变其封建地主立场。容闳之所以无限怀念和过分尊崇曾国藩，完全是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以及他从未同曾国藩切实相处而无由识其真面目所使然，决非后世所谓的阶级调和或阶级合作。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中国特有历史现象，却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现象。